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杨凤城 著

中国共产党与 当代中国文化 发展研究

ZHONGGUOGONGCHANDANG YU
DANGDAIZHONGGUOWENHUA
FAZHANYANJIU

一元与多样化之间的张力

极左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建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知识分子问题到人才问题

中共党史出版社

013035 222

G12
86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中国共产党与 当代中国文化 发展研究

ZHONGGUOGONGCHANDANG YU
DANGDAIZHONGGUOWENHUA
FAZHANYANJIU

杨凤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G12/86



北航

C16424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杨凤城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98-2035-3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共产党—文化事业—建设—研究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2120 号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9mm×239mm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8.25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035-3

定 价:3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3072533

本书为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编写

杨凤城 王顺生 齐鹏飞 主编

丛 书 序 言

2002年年底教育部批准的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之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目前的这套丛书即是这一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所以言其新，是因大致上说来它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在新世纪到来后的事情。学术发展学术流变反映着社会发展社会变迁，或者说同社会发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半个多世纪了，50多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算不上“长时段”，然而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却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一段历程，何况这段历程中，出现过改变民族与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出现过惊心动魄令世人瞠目的重大变革和戏剧性变化。其间，既有凯歌行进、激情澎湃的欢乐乐章，也有极左泛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曲折，更有峰回路转、经济腾飞的壮美与辉煌。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中徘徊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的情况下，惟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绩斐然，为世人瞩目。这一切不值得从执政的角度加以总结与反思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进程令人目不暇接，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等等全新的问题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形成挑战。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进展，中国

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弊端不断被革除的同时,新的问题相伴而生,而且它们不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长期面对同时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了,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业问题、腐败问题,一元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等等。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开拓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但是亦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正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基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和研究价值日益凸现出来,它先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点题”,继之以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响应和讨论,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

“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形成时间短,但其成果就其“短时段”而言却不可谓少,甚至可谓丰富。各种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大有连篇累牍欲罢不能之势,大家欲在这一新领域有所建树的决心昭然。检视该方面的研究,成就不言而喻,新的领域必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论说内容,它们或者是过去不曾有的,或者是过去没有充分展开的。但是,问题或者缺陷亦明显存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研究深度欠缺,学术含量不够。学术研究应做到“走得进”、“出得来”。所谓走得进,就是要深入材料中,对研究对象有一种深度的身临其境的理解;所谓出得来,就是要能够从材料中跳出来,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站在学术高度和立场上进行客观审视。在这方面,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努力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不够。一些观点和结论显得空泛甚至随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即研究者的结论看上去十分正确,然而你会觉得这种十分正确的结论不用花费太多的功夫就能得出,甚至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也能总结出几条同样正确的结论。这样的研究自然缺乏厚重感、历史感。当然,必须马上指出的是,上述缺陷对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言是难以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指出上述缺陷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能够完全克服或者避免这些缺陷。这需要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而努力的开始便是对这些缺陷的自觉。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的研究力求做到客观深入,力求做到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具体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问题意识与总体梳理相结合,纵向考察和横向分析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教训的研究上,在吸收已有中共历史和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建树有所突破。在此思想指导下,我们设计的这套丛书包括六本著作,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与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外交》。

目标设定和实际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往往会存在距离,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或者接近设定的目标,只有等待专家和学者的评判与批评了。这套丛书的总体设计和组稿工作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的杨凤城教授、王顺生教授、齐鹏飞教授负责。借此机会,也特别向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领导、审稿者和责任编辑致谢,感谢他们对书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对丛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杨凤城 记于世纪城

2007年9月17日

目 录

导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两次转型 /1

第一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一元化的文化建设 /16

一、文化重建的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16

二、文化重建的动力机制之一：思想改造 /25

三、文化重建的动力机制之二：思想批判运动 /28

四、组织化与单位化：文化转型与重建的制度保障 /34

小结：一元化新文化形态的确立 /36

第二章：在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文化发展之间的探索 /39

一、“双百”方针与文化的“春天” /39

二、“政治挂帅”与“演中心、唱中心、写中心” /51

三、文化政策的调整、反复及其影响 /57

小结：阶级斗争与文化之殇 /63

第三章：极左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建构 /66

一、“文化专政论”与“斗私批修” /66

二、“文艺革命”与“教育革命” /74

三、影射史学 /89

小结：革文化之命的“革命” /97

第四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00

一、“二为”方向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和阐释 /100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新启蒙运动” /114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138

小结:在政治与文化、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保持张力 /158

第五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60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160

二、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壮大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事业 /173

三、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188

四、科学把握文化前进方向、推动文化发展与繁荣 /196

小结:与时代同步,通过改革创新推动文化发展 /203

第六章:从知识分子问题到人才问题 /205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典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205

二、革命视角与阶级分析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218

三、在知识分子阶级定性问题上的摇摆 /226

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与“人才强国”战略 /252

小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271

结语:经验与启示 /275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79

后记 /283

导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与当代 中国文化的两次转型^{*}

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歧义纷纭的概念。依据我们的研究对象，这里所言的文化是在与经济、政治、社会对应意义上的文化，此其一。其二，即使是与经济、政治、社会对应的文化，其内容也是极其广泛甚至博杂的，因而，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在文化领域最具宏观意义和普遍性的内容。其三，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一步言之，就是研究执政党和政府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研究这种理论、方针与政策指导和影响下的新中国文化发展，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这一研究宗旨决定了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方针与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在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走势，在于方针政策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的研究重宏观，侧重俯瞰式的考察，当然这种考察要抓住主脉、主流和本质，抓住有意义的问题。

依据以上界说，笔者在此拟对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特别是执政六十年多来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两次转型做一回顾，主要探讨三个问题。

^{*} 该“导言”曾以《中国共产党90年的文化观、文化建设方针与文化转型》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上。在此，仅做了个别表述的调整。

一、关于文化的本质、地位与建设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己任,文化问题很早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早期的共产党人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的背景,也使其具备在文化问题上发言的优势。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能给他们提供多少理论资源?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细节的话,其实问题并不复杂。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对文化问题做过系统的专门探讨。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对于文化研究的宏观意义以外,从对中国共产党构成深刻而长远的基础性影响的角度看,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基础制约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纯粹的精神活动。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讲,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文化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具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②其二,在阶级社会文化是有阶级性,并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③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杨明斋等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文化问题,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基本观点。概括地说:其一,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变迁的观点,指出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决定“精神文化”和“思想变动”。同时,文化、道德、宗教、教育等也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

即承认精神力量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虽然李大钊最初认为唯物史观不承认这种反作用)。当然,这一点表达得远没有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那样突出和展开。其二,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在崇古复古,也不在皈依西化,而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瞿秋白语)。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正是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论战正炽之时,早期的共产党人超越东方文化派隆古抑西式的崇古和西化派隆西抑中式的崇洋,阐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路。他们认为,中国旧有文化反映和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纲常,并且已经成为西方列强借以愚弄中国人民的工具,所以主张复活旧有文化,无异于为反动势力张目;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百病丛生,而新兴的健康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即社会主义文明,我们应当欢迎和建设的是这种文化。^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文化问题上形成的基本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具体表述在不断调整不断与时俱进,但内核或深层理念始终如一。当然,在这一深层理念基础上,对文化功能与地位的认识还是不断发生着变化,有的时期变化还是相当显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其文化观亦然,代表作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初名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同中共早期相比,此时的文化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具体。如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而,革命文化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换言之,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因而,文化的评价标准有两个: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其中政治标

① 参见郑师渠主编:《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准第一。^① 这种文化名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体言之,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主的文化。

上述文化观的核心内容在新中国建立后头一个30年间几乎是完整地延续下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反复强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思想文化亦必须进行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思想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应该促进和配合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此外,瞿秋白当年提出的“行向社会主义文明”(亦即建设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文化)到了该落实的时候了。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对此,没有专门文件说明。但通过当年的相关文献和实践还是能够梳理出主要之点的,概括言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彰显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和人民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将文化普及摆在首位,以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为目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本质与地位、功能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其特点是视野更宏阔、更具时代感。一方面,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依然坚持,文化的阶级性原则也没有放弃,但是作为理论支撑退隐到更深层的基础地位上,不再经常提起和突出强调。另一方面,突破了过去主要强调文化的配合作用、配角定位和政治功能的思路和框架,高度重视文化自身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其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相继提出和阐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建设被概括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设专节阐述之,1986年和1996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两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精神文明被界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正如十二大报告所言,这样的说法未曾有过,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48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战略目标；1997 年中共十五大加以郑重确认和阐述。从十五大到十七大，每次党代会报告均设专节阐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并且不断有与时俱进的新认识，如十五大报告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六大报告讲：文化在“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①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揭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当然，无论是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此不难看出，其中既有党的历史上的一贯认识，同时又富有时代感。

另外，世纪之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新时代中共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将文化建设从党所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上升为党的建设的本质层次和政治方向上来”^②，反映了执政党对文化的重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和阐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同样十分重大。既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自然也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仅仅如此理解还不够。与人的全面发展相比，其他发展只具有手段价值。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可以防止将文化功能过于实用主义地工具化的倾向，有利于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知，有利于文化自身相对独立性的保持和遵

①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8 页。

② 郭德宏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27 页。

循自身发展规律的演进。

二、文化与政治——定位文化功能的核心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如何认识和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制约和影响其文化政策与文化工作的核心问题。大体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认识是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准确地说是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个阶段的认识,概言之:文化不能脱离政治,但不能从属于政治。两个阶段的认识及其转变,均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念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从理论渊源上讲,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原理外,列宁的有关思想是不能忽略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便明确讲到,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原则”,“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有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①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明确提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在一般的政治教育或者具体的艺术方面,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所谓“教育不问政治”、“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伪善的欺骗群众的说法。^② 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明确表达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观,毛泽东、瞿秋白和革命根据地有关文化教育的文件均明确:文化教育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核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灌输。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得到明确而系统的阐述,“文艺是从属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302页。

于政治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①等要求成为革命队伍的共识。特别突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工具性，以使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为革命为战争服务的功能，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和文化实践的最重要特征，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配合与推动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化观基本上延续下来，它表现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与实践。从广义上讲，为政治服务就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事业；从狭义上说，就是为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服务。而后者无论从时间上讲、还是从强度和明确性上说均占着主要地位。其表现是将意识形态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过于凸显和胶着于政治正确、“政治挂帅”，从而导致文化日趋政治化。特别是当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使文化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文化大革命”便是证明。在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下，即使将政治理解为整个国家建设事业，那么它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助长机械地理解文化与国家建设事业之间的关系，借助上纲为政治推行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某些做法。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文艺要“写政策”，密切配合政治运动。“大跃进”时期再次提出类似要求，并像物质生产一样，定计划、定指标，要求按期完成，实现“跃进”等等。虽然，这些违背文化发展规律的做法当年已经被清楚地认识到并不断提出克服要求，可是始终收效甚微，甚至日趋严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与贯彻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密切相关。为政治服务需要落实，合乎逻辑的行为自然是细化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沿着为政治服务这一方向推导出来的条条框框如果影响到文化的健康发展因而受到批评，至多是理解的片面或狭窄，而推导不出这些要求或者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则是政治问题。按照这些要求去做，没有做好是艺术实践问题，而不按这些要求去做则是立场问题。

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党的文化建设方针与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策的制定与调整,影响这些方针与政策的弹性或灵活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提出文化产品、文艺创作应力求革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明确文艺服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一方面提出要积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尤其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性和近现代文化的资产阶级性,重视对他们的批判和警惕。在文化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强调在中国文盲占大多数尤其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内,文化普及是第一位的,教育和宣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才能真正体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战争环境中,在局部执政和文化工作主要表现为宣传与教育的情况下,上述文化方针和政策收效是明显的,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直接的。当然,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政治与艺术、继承与创造、普及与提高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存在,只是尚不凸显。

中国共产党执政全国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战争年代形成的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调整或修正的必要。一方面,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改造旧文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活力受到影响。以革命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文化问题实践证明不是长久之计。有鉴于此,毛泽东在1956年和1957年明确提出并不断重申和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的方针;提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只要是有益的,我们都要学习,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际上,在这方面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①)。出于回答当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亟待解答的问题的需要,列宁的思考集中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遗产上。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要全盘否定资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页。